



武汉大学哲学学院
教授丛书

哲学、宗教 与田野调查

宫哲兵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武汉大学哲学学院

教授丛书

哲学、宗教 与田野调查

宫哲兵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哲学、宗教与田野调查 / 宫哲兵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2. 5
(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161 - 0832 - 1

I. ①哲… II. ①宫… III. ①哲学—文集②宗教—文集③社会调查—文集
IV. ①B - 53②B91 - 53③C915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84334 号

出 版 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李 是
责任校对 刘 娟
责任印制 李 建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(邮编 100720)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om.cn>
中文域名: 中国社科网 010 - 64070619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印 张 14.375
插 页 2
字 数 359 千字
定 价 39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 - 6400979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中国哲学史

中国哲学史体系的泛化及其成因	(3)
中国古代哲学有没有唯心主义	(20)
中国古代哲学有没有唯物主义	(34)
中国古代先验论质疑	(55)
中国古代反映论质疑	(66)
中国古代经验论和唯理论质疑	(78)
中国古代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史质疑	(88)
陆象山不是唯心主义哲学家	(98)

性(性别)哲学

性行为的跨文化比较	(109)
男女性别的人类学探讨	(125)
中国南方各民族女性的奇风异俗及成因探讨	(140)

女书与行客

- 女同性恋者的情歌与情感 (156)
- 女性文字与人类文明 (166)

道教与道学

道：祭道路神

- 古“道”字长期被忽略的一个含义 (173)
- 老子与道教 (185)
- 道的信仰 (199)
- 唯道论的创立 (218)
- 当代道教主神的结构体系论
- 兼论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(237)

佛教与佛学

- 超越一般宗教形态的禅宗 (251)
- 惠能与禅宗的认识论哲学 (261)
- 般若真谛：慧远与罗什之辩 (272)

基督教与神学

- 葛洪与奥古斯丁的性伦理观比较 (289)
- 道与上帝 (306)

宗教人类学理论

宗教人类学的现代转变	(317)
现代宗教人类学的方法	(330)

田野调查

中国道商的宗教经济学区位分析	(345)
湖北省黄冈市道教的现状与管理	(383)
湖北省仙桃市宗教场所和神职人员的消长变化	(397)
湖北省武汉市宗教的现状与世俗化特点	(411)
从祭山神看瑶族原始宗教活动的一些特点	(424)
中国盘瑶的“千家峒运动”	(437)

中国哲学史

中国哲学史体系的泛化及其成因*

许多人都有一种感觉，读中国哲学史的书，比起读欧洲哲学史的书，哲学味道没那么浓。笔者认为，原因是目前中国哲学史的体系泛化了，哲学混淆在非哲学的杂质中，所以味道不浓了。哲学从其本质上说应该是纯化的形态，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，哲学关心的不是事物的细节，而是事物的全部；不是事物表面的现象，而是事物精确的原因。哲学不以功利为目的，而以智慧为目的。马克思明确地说：“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，……”^① 纯化的哲学有一定的“度”，过于纯化可能会脱离实际，可能会除了哲学家自己以外谁也不懂。过于泛化则失去了它的抽象品格，甚至失去了哲学之成为哲学的质的规定性。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，成绩是巨大的。但是，临近二十一世纪初回顾，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。笔者认为，体系过于泛化，以至于不能与中国思想史区别，是比较重要的问题之一。

* 原文发表在《求索》1997年第6期。

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一卷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，第121页。

一 哲学起点的泛化

民国初年的学术界，认为中国哲学史的起点是尧舜时代。冯友兰一九一五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的时候，中国哲学史这门课讲两年，每周四小时。一位教授从尧舜讲起，第一学期末才讲到周公哲学，离孔子尚有五百多年。一九一七年，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，发动了一场革命。他不讲尧、舜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等人物，直接从春秋末期的老子讲起，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的“老子起点说”。当时的北京大学学生接受不了这种“一刀砍断”的做法，几乎引起抗议的风潮。而当时的开明学者支持胡适，例如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。一九一八年，蔡元培为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（卷上）写序，称赞胡适敢于“截断众流，从老子、孔子讲起。这是何等手段！”^①当时还有一位青年哲学家称赞胡适的改革，他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冯友兰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冯友兰出版《中国哲学史》也以春秋末期为起点，但他认为《老子》是战国人所作，故中国的第一个哲学家是孔子。关于这一点，胡适与冯友兰在三四十年代有过考证上的争辩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，胡适认为冯友兰的观点不是立于考证，而是立于他尊孔尊儒的宗教信仰。“在这个诚心的宗教信仰里，孔子之前当然不应该有个老子。”^②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，认为中国哲学开始于春秋时代。这个时期的哲学家有管子（或《管子》书）、范蠡、史墨、晏婴等。如任继愈认为，这些人物和他们的哲学，代表朴素

^① 《胡适学术文集·中国哲学史》上册，中华书局1991年版，第2页。

^② 同上书，第8页。

唯物主义的元素论阶段，老子的哲学属于朴素唯物主义的元气论阶段^①。又如冯友兰在这个时期也赞成春秋时期范蠡、计然、晏婴、子产等人的哲学观点^②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，是“殷周起点说”占统治地位的时期。如杨荣国在《简明中国哲学史》上，把殷周哲学隐约分为三个阶段，一是殷商初期奴隶主创造了“一种有神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”，二是殷周之际已有“朴素唯物主义的五行说”，三是殷周末期史伯“用五种物质元素来解释万物的起源”。这是“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”^③。冯契也隐约把哲学的发生分为三个阶段。一是“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原始社会已开始萌芽”，二是殷周之际翻开了“中国哲学史的第一页——原始的阴阳说与五行说”，三是“原始的阴阳说与五行说在西周时期又有发展”，出现了“更为鲜明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观念”^④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，有原始社会起点说，例如李德永。他认为“原始五行思想产生于伟大的治水斗争”，这大致是原始社会末期鲧和禹的时代。他说“原始五行是文明来临时期……谱写出来的一篇关于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五种元素的朴素哲学篇章”，是“唯物主义发展大道上的一个最早的起点。”又说：“如果借用《洪范》的公式，能否在中国哲学史的篇章中写上‘初一曰五行’？”^⑤

从这些回顾可以看出，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起点问题，民国以来可分为五派。第一派是民国初年的“尧舜起点说”；第二派是

① 任继愈：《中国哲学史》第一册，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，第34页。

② 冯友兰：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第一册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，第79—86页。

③ 杨荣国：《简明中国哲学史》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，第1—10页。

④ 冯契：《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》上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63、65、69—70页。

⑤ 李德永：《五行探源》，《中国哲学》第4辑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。

“春秋末期起点说”，流行于二十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；第三派是“春秋起点说”，流行于二十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；第四派是“殷周起点说”，流行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；第五派是原始社会起点说，流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。历史的回顾使我们看到，世纪末的观点非常接近世纪初的观点，而中间经历了一次激烈的改革和逐渐的回落。二十世纪最初的二十余年是激烈的变革期，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起点从尧舜时代一下子拉到老孔时代，缩短的时间大约是一千六百余年。从二十世纪五十到九十年代，起点从春秋到殷周到原始社会时期，逐渐回落到世纪初的起跑线上。

这种回落是前进还是倒退呢？笔者认为前进的地方还是有的，但主要是倒退，造成了中国哲学史体系的严重泛化。对于原始社会，人们只能根据神话传说去猜测当时的情况，根本没有信史可言。那时还没有文字，怎么会有哲学呢？可能会有口头文学的萌芽、宗教信仰的萌芽，但是似不太可能有哲学的萌芽。“文化大革命”（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）时曾辩论过“奴隶有没有哲学”这个问题，至今还记忆犹新。难道现在又要去辩论猿人有没有哲学，石器时代的原始人有没有哲学？恩格斯说：“只有奴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，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，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。没有奴隶制，就没有希腊国家，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……”^①当然更不可能有哲学这种“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”^②。殷周之际的《易经》只是占卜算卦的文字记录，没有哲学思想，任继愈

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3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，第220页。

②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4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，第249页。

对这一点作了很翔实的论证。^① 春秋时期的管仲、范蠡、史墨、晏婴等人，绝大多数是政治家，他们说了一些有哲理的话，但没有论证，没有系统，说他们是哲学家就显得似拔高古人。

战国前无私家著作，这早已是学术界的定论。《老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墨子》并不是老子、孔子、墨子所写，而是他们的弟子和学派传人所纂写，冠以他们的名字。若将这三本书视为战国时期的史料，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老、孔、墨的思想，这是可靠和稳妥的，大家都能接受。若将它们作为春秋时期的史料看待，则学界看法分歧，争论颇多，很难取得一致意见。从内容上看，《论语》、《墨子》是讲政治和道德的，哲学成分很少，有人道之论而少天道之论。《老子》兼论天道、人道，才是中国的第一部哲学著作。它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，应作为中国哲学史的起点。《老子》以前，战国以前，谈哲学的萌芽尚可，若谈哲学家，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，谈哲学发展的阶段，大多属于泛化之论。

二 研究范围的泛化

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范围，超出这个范围去大做文章，就显得体系不严密，就是泛化。中国哲学史，顾名思义是中国哲学的发展史，非哲学的东西不在其研究范围之内，但复杂的是，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广义和狭义的哲学。广义的哲学包括数学、物理和形而上学，狭义的哲学

① 任继愈主编：《中国哲学发展史》先秦卷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582页。

仅指形而上学，他称之为“最高智慧”、“第一哲学”^①。在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中，以本体论、认识论、逻辑学为主要内容。近代笛卡尔也区分了广义哲学与狭义哲学。狭义的哲学是“根”，包括形而上学和逻辑学。广义的哲学除了“根”以外，还有“干”，包括物理学和数学；有“枝”，包括伦理学、医学、机械学^②。近现代西方编写的欧洲哲学史，一般都是狭义哲学的历史，其范围包括本体论、认识论、逻辑学三部分。中国哲学史，一般来说，也应该是狭义哲学的历史。宗教能划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围吗？显然不能。欧洲近代哲学是在反对宗教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。霍布斯曾明确地说：“哲学排除神学”^③。欧洲中世纪只有一种意识形态，即宗教和神学，“它把古代文明、古代哲学、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”^④。恩格斯认为，古希腊哲学在中世纪处于“冬眠状态”，而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才重新觉醒，因此中世纪的基督教在欧洲哲学史上不占重要地位。但是，在目前的中国哲学史体系中，宗教，主要是佛教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；特别是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哲学史，基本上成为佛教哲学史，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泛化。张岱年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反对这种泛化。他在《中国哲学大纲》中说：“本书所谓中国哲学，乃是指‘中国系的一般哲学’。因是专指中国系的，所以中国佛学的思想，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。因是专指一般哲学，所以中国的美术哲学、历史哲学，本书也都不论及。”^⑤ 佛学基本上不进

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：《西方哲学原著选读》上卷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，第122—124页。

② 笛卡尔：《哲学原理》序言，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。

③ 《西方哲学原著选读》上卷，第385—386页。

④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7卷，第400—402页。

⑤ 张岱年：《中国哲学大纲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3页。

中国哲学史，笔者是赞成的。可能有人会提出异议，宗教也有哲学，为什么不属于哲学史的范围呢？笔者认为，一般哲学与宗教哲学有本质的不同。一般哲学以理性为基础，它是自己的主人，而宗教哲学以信仰为基础，它是神学的“婢女”。宗教哲学是神学的分支，而不是哲学的分支；它属于宗教史的内容，而不是哲学史的内容。恩格斯说得很清楚：“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——哲学、政治、法学，都合并到神学中，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。”^①

有的学者认为，宗教神学就是唯心主义哲学，所以属于哲学史研究的范围。这种看法不能成立。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都承认有超物质的主宰者，但前者的主宰是精神，后者的主宰是人格的神。前者探讨的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，后者宣讲的是神与人的关系。历史上有许多唯心主义哲学家不信神，如休谟、费希特、尼采等，这也说明唯心主义与宗教神学不能画等号。中国哲学史中包括大量的佛教、道教等内容，一方面说明中国哲学史体系的泛化，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宗教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。与这些问题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，即无神论与唯物主义的关系。有人认为无神论就是唯物主义，中国无神论史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。的确，在现今的中国哲学史体系中，包括了大量的无神论者的无神论思想。但是这样做并不合适，因为中国无神论史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和范围。中国无神论史主要研究中国无神论思想在同有神论斗争中产生、发展和演变的规律。它的研究范围是对灵魂、鬼神思想的批判，对佛、道等宗教的批判，

^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4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，第251页。

对各种封建迷信的批判，等等^①。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显然不是上面这些。

相当多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把古代宗教与哲学混为一谈。例如任继愈主编的《中国哲学发展史》是近年来很权威的一部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，该书作者认为，从先秦到隋唐，哲学斗争是围绕着“上帝”、“天命”、“佛教”等问题展开的^②。该书作者似乎认为，隋唐以前的哲学中心问题是“上帝”、“天命”、“灵魂不死”、“因果报应”等问题，哲学派别是无神论与有神论。无神论即唯物论，有神论即唯心论。这是一种宗教与哲学相混同的认识，它必然导致中国哲学史体系的泛化。

三 背景分析的泛化

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逻辑分析的方法，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发现历史上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。列宁说：“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——这才是需要的东西。”^③ 哲学史研究的另外一种方法是背景分析的方法，即研究不同时代政治社会生活对哲学的影响和制约。

写中国哲学史，要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，要有主有次，才能相得益彰。但是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有关的中国哲学史体系著作，关于政治和社会背景的论述往往过多，分析哲学家的阶级立场和历史功过的论述往往过多，以至于这些论述加起来几乎

① 参见牟钟鉴《中国无神论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主要问题》，《哲学研究》1979年第2期。

② 任继愈：《中国哲学史》第一册，第14、42、214页；第二册，第13、156页；第三册，第11—12页，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。

③ 《列宁全集》第38卷，第188页。

占到某些著作全书一半的内容，造成严重的泛化。下面将冯友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《中国哲学史》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（以下简称《新编》）做比较，就可明显地看出，前者是相对精化的，后者是严重泛化的；前者是中国“哲学”的历史，后者写成了“政治社会环境影响哲学”的历史。

冯著《中国哲学史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运用逻辑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的范畴，将许多过去认为模糊不清、歧义迭出的概念、命题给予澄清^①。并且总是结合范畴分析，来说明哲学家的哲学体系。例如，先秦名家的观点一向被认为难懂，认为“离坚白”、“合同异”都是诡辩，公孙龙和惠施的演说被混为一谈。冯友兰从逻辑分析入手，将公孙龙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——“指”，界定为共相，并进一步区分了公孙龙“离坚白”和惠施“合同异”这两个派别。运用逻辑的方法，冯友兰判断中国哲学史始于孔子，故书中孔子以前的内容十分简略。冯著《中国哲学史》在《孔子》之前只写一章，不到一万字，内容归在“鬼神”、“术数”、“天”、“一部分较开明之思想”、“人的发现”五个标题之下。这一章从标题到内容，大体说明了哲学胚胎的萌生过程。冯著《新编》运用的则主要是背景分析的方法，其第一册一共九章，在《孔子》之前已有三章，五万多字，写的全部是政治社会大背景。大标题如《齐晋两国的改革及齐桓、晋文的霸业》，小标题如《管仲在齐国相地衰征的历史意义》、《管仲对于分封制的改革》等等，无异于政治史或一般历史著作。《孔子》以后有六章，每章第一节都是写时代背景的。《新编》共有七册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前六册），每册绪论部分都是写阶级斗

^① 冯友兰：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第一册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246页。